半守师说:程尹授受与程颐晚年定论

汤 元 宋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二程门下弟子有早期与晚期之别,其中尹焞可谓程颐晚年最重要的门人。朱熹基于道统建构的考量,对程门弟子有系统性的负面评价,但在朱熹之前,尹焞已有类似批评。受朱熹影响,理学史多以为尹焞的思想较为保守,仅传承程颐主敬工夫。对尹焞而言,他的保守恰恰是对师说的恪守,是对程颐思想最忠实的传承。作为程颐晚年高度肯定的门生,尹焞对同门的批评、对师说的坚守,或许折射出程颐思想的另一番面貌,即未经朱熹诠释的程颐晚年定论——专以持敬为主,而非持敬、格物并重。朱熹对尹焞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肯定尹焞是"深信程子者",另一方面又批评尹焞持敬有余而格物不足,这种"半守师说"的尹焞形象,也代表着程朱之间的一种张力。

关键词:尹焞;程门;程颐;主敬;道统
中图分类号:K 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6)03-0098-12

一、程门传统叙事的反思

过往学界对程门弟子的研究,多聚焦于少数高弟,如程门四先生——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其中尤以谢、杨为重。近年来,市来津由彦、赵振、李敬峰、申绪璐等留意到更广泛的程门群体,①亦尝试引入哲学史之外的研究视角,如孙逸超从政治史、社会史角度分析程门内不同集团。② 但更鲜明地时间性视角,即程门弟子自身年岁和他们向二程问学先后间的显著差异,依旧有助于学界突破现有二程和程门研究。

其一,以年岁论,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与门下诸多高弟,如朱光庭(1037—1094)、吕大临(1040—1093)、谢良佐(1050—1103)、杨时(1053—1135)和游酢(1053—1123)等,或为同代人,或相差一代人。③ 而张绎(1071—1108)和尹焞(1071—1142),与他们的师兄又几乎差了

收稿日期:2025-09-30
作者简介:汤元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13世纪政治与社会再探研"(22JD770005)阶段性成果。

① 市来津由彦所作《朱子门人集团形成的研究》,虽以朱子门人为题,但该书第一章《北宋末年程学之展开》与第二章《南宋初的程学》,主要聚焦程门弟子,参见市来津由彦:《朱熹門人集団形成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02年版,第29—121页。赵振:《二程语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李敬峰:《二程后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申绪璐:《人能弘道:二程语录与洛学门人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② 孙逸超:《流寓江南:南宋前期道学文本的传衍与思想的展开》,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22年;孙逸超:《道学汴洛故家与绍兴政局中的尹焞》,《中华文史论丛》2023年第2期,第257—289页。

③ 《宋元学案》以为朱光庭"绍兴元年卒,年五十八岁",显误,"绍兴"当为"绍圣",吕大临生卒年学界尚有争论,暂取李如冰之说,谢良佐卒年尚难确证,但吕大临和谢良佐学界所争不过数年,并不影响本文讨论。参见黄宗羲撰,吴光点校:《宋元学案》卷三〇,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4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页;李如冰:《吕大临生卒年及有关问题考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28—30页。

一代人。其中尹焞又格外特殊,较之张绎早逝,尹焞迟至南宋,还在同门、士林中发挥作用。其二,门人问学于二程,亦有早晚之别。如嘉祐元年(1056) 吕希哲、邢恕等于开封首以师礼从游程颢,元丰元年(1078) 游酢、谢良佐往扶沟从学二程,元祐五年(1090) 尹焞登程颐之门,前后相距三十五年。①

有鉴于此,本文权以早年弟子和晚年弟子区别这两类门人。因本文论题重在程颐晚年弟子与晚年之学,故对早年弟子不再做进一步区分。所谓"晚年",特指程颐自绍圣四年(1097) 十一月编管涪陵起的人生最后十年。而门人问学早晚还有一显著差异,与早年弟子师从二程不同,张绎和尹焞仅问学于程颐一人,并且他们对于程颐晚年被贬涪陵后的转变,也有更直观的体察。

传统理学史叙述中,程颐晚年弟子很少得到专门对待。但程颐晚年对于尹焞和张绎屡加称许,颇有将二人视为门下龙象的意味。如"(程) 子谓尹焞鲁,张绎俊",又如"公(尹焞) 与张绎同时师事伊川,张绎以高识,公以笃行,俱为所称"。程颐此类表述颇多,时人与南宋理学群体亦多将尹、张并举,视为程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此不枚举。② 但在更一般性的理学史中,是二程早年弟子,特别是谢良佐、杨时,在理学史中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值得检讨的理学叙事之一。其原因或在于两点: 其一,两宋国势陵夷,使得南宋以湖湘学、闽学为代表的理学崛起,杨时作为道南一脉核心人物,多受推崇; 其二,杨时、谢良佐深刻影响了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是南宋初期理学大宗,后虽受朱熹批评,但朱熹的批评也强化了杨、谢在理学史中的地位。谢良佐、杨时居于理学史叙事中程门的中心位置,可能也带动了早年弟子普遍受到更多关注。

朱熹对程门弟子的评价,是理学道统叙事的经典案例。朱熹虽推崇二程,但对程门弟子则多有批评。朱熹在淳熙十六年(1189) 撰写的极具道统意味的《中庸章句序》中,即批评程门弟子不能传二程"所以为说者",甚至有"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③ 在《朱子语类》中,黎靖德特意编有一卷"程子门人"以汇总朱熹意见。此卷先总论程门弟子,之后以人为目、分别点评。所谓"总论",主旨即是整体性地批评程门无人得二程真传。如"总论"首两条即说:

> 问:"程门谁真得其传?"曰:"也不尽见得。"
>
> 程子门下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见伊川不曾许一人"。④

之后如"二先生衣钵似无传之者","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立一家""程门弟子亲炙伊川,亦自多错"等整体性的批评屡见。⑤ 分论部分亦对程门弟子颇多批评。朱熹甚至认为程门普遍存在背离儒学、流于佛老的根本性问题。如朱熹在绍熙四年(1193) 所作《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言:"程氏既没,诵说满门,而传之不能无失,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⑥对程门"满门"如此严厉批评的背后,是朱熹认为唯有自己方能接续二程道统的自信,正如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所言,他对于二程思想,是"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

---

① 姚名达:《程伊川年谱》,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70、153 页。另据《尹焞年谱》,尹焞因苏昞之推荐而问学伊川,当在元祐二年(1087),参见尹焞撰,周生春、吴永明、孔祥来校点:《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儒藏》(精华编) 第 221 册,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69—770 页。

② 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412 页;《和靖尹先生文集》卷八,第 855 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 页。

④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〇一,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555 页。

⑤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 2557、2559 页。

⑥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 第 24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803 页。

者”。①

然而,二程身后,斥责程门,以道自任,却非始于朱熹,而这与程门中早年弟子和晚年弟子的分野或许息息相关,也预示着对二程思想另一种全新理解的可能。

二、尹焞的程门判教

学界对于程门的印象,长期笼罩于朱熹批评之中,使得先于朱熹半个世纪即已展开的程门内部判教,始终未受到重视。对程门的整体性批评,尹焞即已有之。

学界论及理学语录之不可尽信,常引程颐所言“某在,何必观此(语录)”一语,此语出自尹焞绍兴六年(1136)所作《师说序》,有特定语境:

> 昔得朱公掞所编《杂说》,呈先生(程颐:“此书可观否?”……先生曰:“某在,何必观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记得他意。”……(尹焞自言取入蜀所见程颐语录数本),以所见无疑者,辄成此书,目为《师说》。②

朱光庭作为程门最年长者,久居二程门下,他所编二程语录《杂说》,在程门中曾广为流行。③ 而尹焞作为程颐晚年弟子,借伊川之口,批评朱光庭所编颇可商榷。语录非皆不可信,尹焞作为程颐晚年高弟,便自信可以取其“无疑者”,编成同为语录体的《师说》。次年,尹焞在《题伊川先生语录》中,再次提及程颐批评朱光庭所编《杂说》一事,随后更直白地写下:“焞侍坐,先生诲之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死而大义乖。’信然! 今日道学绝讲,亲炙者无几,则迷妄失真亦固多矣,可不哀哉。”④在尹焞看来,朱光庭等所编语录之不可信,并非语录这一文体存在天然缺陷,而是编者本身不足以传程颐之思想。⑤

在延续朱熹所编《程氏遗书》《程氏外书》架构的今本《二程集》中,尹焞及其门人所记的二程语录,居于末席之末席,即罕有人留意的《程氏外书》最后一卷《传闻杂记》之中。⑥ 而居于《程氏遗书》前列的,是李端伯、吕大临、谢良佐、游酢等早年弟子所记语录。但在南宋也曾有过以尹焞所记语录为首的二程语录。如《直斋书录解题》就曾记尹焞门人韩元吉家藏十卷本二程语录,其中便以尹焞所记为首。⑦

除了批评朱光庭,尹焞也批评杨时、侯师圣等人。如《传闻杂记》所收《和靖语录》中,录有尹焞所述程颐认为杨时对于《西铭》的理解最终依旧“未判然”。⑧ 又如时紫芝所编二程语录中,记有尹焞所述程

---

① 《四书章句集注》,第 15 页。

②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四,第 810 页。尹焞取朱光庭所编《杂说》呈问程颐一事,朱熹也有评述,但角度与尹焞截然不同。参见《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 2577 页。

③ 朱光庭在程门地位颇为特殊。《宋元学案》以为“程门大弟子”,参见《宋元学案》卷三〇,《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 4 册,第 334 页。学问之外,朱光庭和程颐的政治生涯绑定极深。孔文仲元祐二年《劾程颐疏》、苏辙元祐六年《劾朱光庭札子》皆可佐证,朝堂之上对于程颐的几次政治攻击,往往是从朱光庭下手。

④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四,第 811 页。

⑤ 尹焞还曾亲自批点胡安国家传本二程语录,以为其中某段文字可疑。对程门流行的各种语录多有不满,本身也代表着尹焞对同门的一种看法。参见《二程集》,第 392 页。

⑥ 《传闻杂记》所收二十种文献中,如《涪陵记善录》是尹焞门人冯忠恕所记的尹焞所言程颐语,而《和靖语录》分别包括尹焞两位门人祁宽和吕坚中所记的尹焞语录。对于朱熹编次的二程语录而言,此卷似非高质量文献,所以历来学者罕有留意,但其中颇能窥见尹焞一系对于程门的看法。如《程氏外书》所收《涪陵记善录》仅八条,但《和靖尹先生文集》中保留了更多条目和相关序跋文字。

⑦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7 页。

⑧ 《二程集》,第 437 页。

颐批评侯师圣的一段文字,“(程颐) 谓侯师圣议论,只好隔壁听。”①

尹焞还曾多次批评谢良佐。其中显著者如明确否认程门所传伊川以为谢良佐有王佐之才的传言:“冯贯道问和靖先生曰:‘人言伊川先生谓谢显道有王佐才,果否?’先生曰:‘不曾闻得。’”②下文稍加铺成较为隐晦的案例。尹焞门人王时敏曾仿尹焞编程颐语录为《师说》,亦编成尹焞语录名为《师说》,其中记载了师徒间一段问答:

> 时敏问:“《伊川语录》载,人问‘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答曰:‘会得时,活泼泼地。会不得时,只是弄精魂。’不知当时曾有此语否?”先生曰:“便是学者不善记录。伊川教人,其不甚晓者,多以常言俗语引之,人便记了此两句。”③

其中所言“学者不善记录”,所指便是谢良佐。今本《程氏遗书》卷三是“谢显道记忆平时语”,此卷首条便是此语。谢良佐所记二程语录,应曾单独流传,此卷首条在当时程门中或广为人知,但尹焞却以为谢良佐“不善记录”,未得师说。

对于谢良佐与尹焞之关系,谢、尹两系所记笔法,颇有差异。如谢良佐和尹焞曾一度同在程颐处问学,《上蔡语录》中载:

> 谢子见河南夫子,辞而归,尹子送焉,问曰:“何以教我?”谢子曰:“吾徒朝夕从先生,见行则学,闻言则识。譬如有人服乌头者,方其服也,颜色悦怿,筋力强盛,一旦乌头力去,将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谓益友矣。”④

在谢良佐笔下,他较之尹焞是入门更早、得道更深的师兄,尹焞在送别之际,是以极为谦恭的姿态问谢良佐:“何以教我”,而谢良佐之告诫正中尹焞之弊,程颐谢良佐之言亦颇为认同。⑤ 而尹焞一系的叙述则不同,尹焞门人祁宽所作《和靖语录》中曾载:

> 伊川归自涪陵,谢显道自蔡州来洛中,再亲炙焉。久之,伊川谓先生及张思叔绎曰:“可去同见谢良佐问之,此

---

① 《二程集》,第 417 页。尹焞借程颐批评侯师圣此语,此后又经由李侗、朱熹的转述,取代湖湘学派对于侯师圣的正面看法,逐渐成为南宋之后侯师圣形象的定见。朱熹曾以侯师圣论《中庸》鬼神之德为例,认为侯说“乍读如可喜者,而细以经文事理求之,则失之远矣,程子所谓‘只好隔壁听’者,其谓此类也夫!”(参见朱熹撰,黄坤校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 6 册,第 579 页)朱熹晚年与陈淳论及程门高弟,也说“侯师圣太粗疏,李(侗)先生甚轻之”。(《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 2557 页)相较而言,湖湘学派对于侯师圣颇为肯定,胡安国称许侯师圣“讲论经术则通贯不穷,商榷时事则纤微皆察”,并遣胡宏问学于侯师圣。(参见黄宗羲著,吴光点校:《宋元学案》卷三〇,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 4 册,第 332 页)胡宏也以为侯于二程问学最久、悉知二程文章最详。(参见胡宏撰,吴仁华点校:《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89 页)朱熹中年与张栻论学,言及侯师圣所作《论语解》,径直批评从此书可见侯师圣“无深潜缜密、沈浸酞郁之味,故于精微曲折之际不免疏略,时有罅缝”,亦有与湖湘学派就如何看待程门弟子进行商榷之意味(参见《朱文公全集》卷三〇,《朱子全书》第 21 册,第 1313 页)。

② 参见尹焞:《和靖先生语录》卷上,苏州图书馆藏明抄本。苏州图书馆所藏《和靖先生语录》、北京大学所藏《尹和靖言行录》等程门文献,此前学界较少留意,其中所记条目颇有可增补二程、程门研究的线索,参见祁博贤:《刘宗周敬论之发展》,《哲学研究》2026 年第 2 期,第 102 页。

③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八,第 852 页。祁宽亦曾记尹焞问程颐“鸢飞鱼跃”,所记亦可参照(《二程集》,第 432 页)。

④ 《二程集》,第 427 页。

⑤ 谢良佐所言“乌头”之喻,在此段文字中稍显晦涩。不过宋人也曾记载谢、尹此事。“伊川云:‘以富贵骄人固非美事,以学问骄人害亦不细。’此真格言也。予闻尹彦明从学于伊川,闻见日新,谢显道谓之曰:‘公既有所闻,正如服乌头,苟无以制之,则药发而患生矣’。显道之言诚可为浅露者之戒。”(参见赵善璙撰,程郁整理:《自警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 页)在宋人笔下,谢良佐的临别直言,恰恰切中了程门后进者尹焞之弊,甚至颇有迎面凉水之意。

> 回见吾,有何所得。”尹、张如所戒,谢曰:“此来方会得先生说话也。”张以告伊川,伊川然之。①

在尹焞的讲述中,入门颇早的谢良佐,至程颐晚年涪陵归后,再次问学之际,方才领会程门要旨;而尹焞则在程颐晚年归自涪陵后日日亲炙身旁,②较之其他门人自然别有不同,甚至隐隐有代程颐扣问谢良佐的意味。

对于程门早年弟子中颇受同门肯定的刘绚,尹焞也有所批评。侯师圣认为“明道平和简易,惟刘绚庶几似之”;谢良佐也认为程颐之春秋学,“其门人惟刘质夫得先生旨意为多”;朱熹虽批评程门弟子,但也颇为肯定刘绚、李籲二人,以为唯此二人早逝时,程颐所作祭文有“传道之难”的感叹,而对其余过世门人,程颐皆无此言。③ 但尹焞门人祁宽记录下尹焞的另一种看法:

> 昔刘质夫作《春秋传》,未成。每有人问伊川,必对曰:“已令刘绚作之,自不须某费工夫也。”刘传既成,来呈伊川,门人请观。伊川曰:“却须着某亲作。”竟不以刘传示人。伊川没后,方得见今世传解至闵公者。④

在尹焞笔下,即便刘绚最擅长的、并一度被视为得程颐旨意最多的春秋学,最终成稿后,反倒证明了并未达到程颐的期许,甚至其中或有误解程颐春秋学旨意处,所以程颐不将刘书示人。

还有连朱熹都颇为肯定的吕大临,尹焞或许也有些许讽刺。时紫芝所记二程语录中曾有一事:

> 吕与叔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⑤

时紫芝所记未详出处,⑥但此事能在程门流行,恐最初是出自尹焞本人。或许在尹焞看来,吕大临作为张载、二程门下弟子,在为张载所作如此重要的行状中,却于张载、二程学问渊源,皆未能准确评述。

舍此之外,尹焞还批评同门邢恕、冯理等人,此不一一详述。⑦ 若通览程门弟子之间的互评,尹焞与其他门人有一明显的区别:其他程门弟子之互评,或褒贬参半,而尹焞判教的色彩最为浓厚,甚至可以说,今天留存文献中程门内部的负面评价,多半与尹焞有关。

综上,在朱熹系统批评程门弟子背离师说前,尹焞就已对同门有整体批评,而这种批评尤其聚焦于二程早年弟子。⑧ 若尹焞门下有如黄士毅、黎靖德之人能编《尹子语类》,或许亦能有一卷如《朱子语类》之论程门弟子,并且在“总论”“分论”皆能辑出尹焞相关语录。

前引《朱子语类》“程门弟子”卷次条,朱熹曾引尹焞所记“见伊川不曾许(程门)一人”,以佐证他对程门整体批评,并由此暗示惟有自己方能接续二程道统。实则当年尹焞在援引程颐此语时,用意也是如此。只不过半个世纪后,当朱熹转述尹焞此条语录时,尹焞也被朱熹一并归入需要被批判的程门之中。

---

① 《二程集》,第 434 页。

② 《二程集》,第 444 页。程颐晚年被贬涪陵后的十年,程门当有较为明显的变化,程门除了尹焞,其他弟子也较为重视这一线索,如杨时所记语录,便会强调程颐自涪陵归后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从而感慨“学者皆流于夷狄矣,唯有杨、谢二君长进”,参见《二程集》,第 429 页。

③ 《宋元学案》卷三〇,《黄宗羲全集》第 4 册,第 330—332 页。

④ 《二程集》,第 432—433 页。

⑤ 《二程集》,第 414—415 页。

⑥ 时紫芝与尹焞的关系,尚难确定。时所记二程语录,被收录在《程氏外书》卷十一,其中于尹焞皆称“尹子”,且多有肯定。其中不乏语录直接来自尹焞,如第十九条,“子谓尹焞鲁,张绎俊,俊恐过之,鲁恐终有守。”刘宗周曾辑有《和靖先生佚语》,即收此条,以为是尹焞所记,参见尹焞:《尹焞集》卷五,国家图书馆藏明天启四年本,第 15 叶 b。

⑦ 《二程集》,第 27 页;《宋元学案》卷三〇,《黄宗羲全集》第 4 册,第 344 页。

⑧ 尹焞笔下,评论较多的另一同门是与他同为程颐晚年高弟的张绎,此又是另一公案。但张绎在程颐过世后次年离世,与在南宋依旧发挥作用的其他程门弟子有所不同,本文暂不讨论尹焞与张绎的关系。

三、程尹道统授受

尹焞一系的道统叙述方式，一方面是借程颐之口、或尹焞自己直言，批评程门早年弟子未得师说，另一方面是刻意叙述程颐对尹焞的高度肯定。上节专论前者，本节稍加铺陈后者。

在尹焞或其门人笔下，尹焞、程颐问答后，常有“伊川颔之”“伊川大赏之”的肯定。这些肯定，并非泛泛欣赏，而是带有高度的道统授受意味。其中有几条语录，最可玩味，如尹焞门人冯忠恕所作《涪陵记善录》中云:

> 鲍若雨、刘安世、刘安节数人自太学谒告来洛，见伊川，问:“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尧舜之道，何故止于孝弟?”伊川曰:“曾见尹焞否?”曰:“未也。”请往问之。诸公遂来见和靖，以此为问。和靖曰:“……”复以此语白伊川，伊川曰:“极是。纵使某说，亦不过此。”①

鲍若雨等人集体问学于程门时，尹焞作为程颐晚年高弟，替师代答之事，在尹焞和鲍若雨笔下都曾多次记载，但彼此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尹焞一系笔下，尹焞具有替程颐指导远来门人的特殊身份，而且他所讲述的义理，连程颐都高度认同，以为“极是，纵使某说，亦不过此”。但在鲍若雨笔下，尹焞完全是隐遁的，鲍若雨在意的，只是详细记录下他和程颐的具体问答。②

鲍若雨与尹焞问答例，诸家所记互文较为复杂。尹焞自己记有此事;③尹焞门下，除前引冯忠恕外，祁宽和吕坚中也曾三次记录此事。④ 其中如吕坚中记此事，更是在程颐肯定尹焞所教与己无异后，追加了一段问答，而终之以程颐对尹焞自陈“某思虑不及”，⑤愈发凸显尹焞作为程门高弟之形象。

还有一组广为人知的程颐语录，也同样出自尹焞一系数人所记。下文汇集尹焞、祁宽、吕坚中所记之细节，以呈现其全貌:

> 伊川自涪陵归，《易传》已成，未尝示人。门弟子请教，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一日出《易传序》示门弟子，先生(尹焞)受之归，伏读数日后，见伊川。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似太泄漏天机。”伊川叹美曰:“近日学者何尝及此，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诗序》二篇，外人传之不真。先生一日请问:“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请，乃得之，曰:“为子出此二篇。”今传之者是也。⑥

此事在尹门是广为人知的故事，在他们笔下，程颐晚年自涪陵归后之学问定见，其中最为隐微、似泄天机的义理，门下弟子皆不足以传是学。唯独尹焞，可以洞察隐微令程颐激赏，可以令程颐破例出示秘不示人的文稿，甚至连后世所传之伊川学，亦多有赖于尹焞。

一如《明道先生行状》可视为二程兄弟之道统宣言，《中庸章句序》可视为朱熹一系的道统宣言，尹焞一系的道统观，集中体现于尹焞弟子吕稽中与同门共定的《尹和靖墓志铭》:

> (尹焞曰)“昔者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殁，圣人之道不传;从千余载之后，得不传之学者，伊川程夫子也。”先生(尹焞)曰:“吾晚得伊川之道。”四方师事之如伊川……程夫子之语门人，每恨其差也，曰:“差之毫厘谬以

---

① 《二程集》，第 431 页。

② 《二程集》，第 309—310 页。《程氏遗书》卷二十三为鲍若雨所记，其中第二十四、二十五两条，与尹焞门下所记堪称“同闻异录”。

③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八，第 855 页。

④ 《二程集》，第 431、435、441 页。疑祁宽第二次所记，是修改自尹焞本人语录。这种辗转记录、层累相叠而道统色彩渐浓或转换语境，在理学语录中并不鲜见。如本文所引程颐评价张绎、尹焞语，之后被尹焞转述，以及尹焞所记程颐批评程门语，之后又为朱熹所转述，只是本义与新意之间，或微有差别。

⑤ 《二程集》，第 441 页。

⑥ 《二程集》，第 430、439—440 页;《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七，第 846 页。

> 千里。”程夫子之殁久,门人高第日微而说又差……(因尹焞)而后学者复闻其正,而知其差,而孔、孟、程氏之学复明。……大观中新学日兴,有言者曰:“程颐倡为异端,尹焞、张绎为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声闻益盛,同门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铭曰:道之不明,学失其传,或得其一,莫见其全……流为怪诞,变为异端,滑稽支离……惟吾先生,得传之正。①

在尹焞一系叙述中,可以清晰辨认出《明道先生行状》中自信超迈汉唐、接续孔孟之学的二程道统观;也可以看出朱熹批评程门、以自己接续二程的第二重道统观。② 尹焞早于朱熹半个世纪,就已批评同门流为怪诞,变为异端,滑稽支离;而最为重要的,是尹焞一系借助程颐亲口所言之“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将尹焞塑造为“惟吾先生,得传之正”之程门第一人。

然而理学史的演进,并未如尹焞及其门人所愿。多年后,当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时,他虽然采用了吕稽中此铭不少文字,甚至也保留了程颐所言“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之语,但却并未采信其他有助于形塑尹焞批驳同门、独任道统形象的文字。朱熹自然是洞察了吕稽中此铭的用意,他自己便是此种笔法的个中高手。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叙述程颐亡后时写道,“先生既没,昔之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③。其时程门杨时、游酢、张绎、尹焞皆还健在,但在朱熹眼中,已无人能准确评价程颐的生平与思想。

朱子道统观形成后,笼罩理学史数百年,至晚明,尹焞才有机会重新回到理学史的主脉络,被视为独得程门正传。与尹焞同样标举敬之工夫的刘宗周,在《重刻尹和靖先生文集序》中云:

> 程子之门,独得其传者,和靖尹先生也……及其门者首称四先生,晚年更得先生与张思叔云。今试论之,两程子道大而诣高,门弟子各以质之所近为学,如上蔡、定夫、中立诸君子,皆高才敏悟,出入师说,不免或杂于禅。中立出处一节,终费解说;思叔早世,亦未见所至;惟先生独自附于古之鲁者,以一敬做成……程叔子亦遂称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④

刘宗周将程门早年高弟之杂于禅、尹焞之恪守师说,归结为个人材质之别,或可商榷。全祖望亦对尹焞有一评价:“和靖尹肃公于洛学最为晚出,而守其师说最醇。”⑤全祖望虽未有明确的程门早年、晚年弟子之别的意识,但所言却无意中点出了尹焞作为晚年弟子与守师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尹焞之“半守”师门敬字

虽然尹焞批判同门、独任道统的主张,并未获得太多认同。但几乎所有人,包括程颐、程门弟子、尹焞本人、尹焞门人、时人、乃至朱熹和他的学生、后学,普遍认为尹焞能守师说。此类文字颇多,仅举其要者。

程颐晚年,喜将门下高弟张绎和尹焞加以对比,并各有侧重。在尹焞一系看来,相较之下,程颐当更肯定尹焞之能恪守师说:

> 子谓尹焞鲁,张绎俊,俊恐他日过之;鲁者终有守也。⑥
>
> 先生与思叔共学之久。一日,伊川问:“二子寻常见处同否?为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请问未达,必三四请益,尚有未得处,久之乃得。如思叔则先生才说便点头,会意往往造妙。只是某虽愚钝,自保守得。若

---

① 《和靖尹先生附集》卷十,第 866—870 页。

② “两重道统论”出自土田健次郎语,参见土田健次郎著,朱刚译:《道学之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65—468 页。

③ 《二程集》,第 346 页。

④ 刘宗周著,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 4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7 页。

⑤ 《宋元学案》卷二七,《黄宗羲全集》第 4 册,第 259 页。

⑥ 《二程集》,第 412 页。

思叔则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 “也是,也是。”①

“终有守”“自保守得”,说明程颐最为看重的便是尹焞之恪守师说。尹焞亦颇以“鲁”而能守自诩,尹焞门人所记尹焞语录: “先生读《论语》,到‘柴也愚、参也鲁’,叉手而起曰: ‘某平生亦得一个鲁力。’”②朱熹也颇为肯定尹焞之能守师说。《朱子语类》程子门人条论尹焞子目下,起首便言: “和靖在程门直是十分钝底”; 之后第二至第七条,条条皆从“守”字入手评价尹焞,屡屡说尹焞“守得紧”“持守有余”“只紧守伊川之说”“持守得不失”“守得谨”“据其所闻而守之”。③ 在《四书章句集注》所征引的程门高弟文献数量,尹焞以 102 处居首,其余如杨时 77 处,谢良佐 51 处,吕大临 17 处,游酢 8 处。④ 朱熹曾屡次和门人讨论程门诸家所解《论语》,也反复以为较之其他门人,“却是和靖说得的当”,“尹氏语言最实,亦多是处”。⑤

尹焞之恪守师说,具体所指便是尹焞专以师门“敬”字为宗旨。尹焞之初见程颐,程子便教其“看敬字”; 此后尹焞亦主张,程颐教人“只是专令用‘敬以直内’”; 尹焞门人王时敏所编尹焞语录《师说》中也坦言“(尹) 先生教人,全在涵养”,⑥而程门多言“涵养须用敬”,涵养即为敬之别名,尹焞之教导门人,一如他所理解接受的程颐教法; 朱熹也说尹焞“只就一个‘敬’字做工夫”。⑦

与“守”字相应,《朱子语类》程子门人条论尹焞子目下另一文眼,便是“半”字。朱熹直言程颐之学,“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⑧ 何谓“明得一半”? 黄宗羲即点破朱熹之意: “晦庵谓其只明得一半,盖以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和靖用得‘敬’一半,缺却‘致知’一半也。”⑨即尹焞只能守程门“敬”字,而于“格物”有所欠缺。由此,朱熹屡屡批评“和靖持守有余而格物未至”,“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穷理之功少”。⑩ 《朱子语类》中有一条朱熹对尹焞看似颇为碎片的批评,“尹和靖疑伊川之说,多其所未闻”,⑪其所指也与格物有关。尹焞曾主张“‘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程子之言”。⑫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对于朱熹的格物思想而言,是最基本的工夫法门,朱熹自然不能接受尹焞所谓此非程颐之言的判断。如果说涵养是北宋以来程门之旧说,那对于格物的高度重视、甚至为《大学》做格物补传则更多是朱熹的独造之功。在日渐重视格物的视域下,不仅尹焞是“明得一半”,曾被朱熹认可、与北宋五子一并纳入《六先生画像赞》的司马光,最终也会被朱熹以“格物之未精”而从《伊洛渊源录》中祧之。⑬

然而,稍加思量,不难看出朱熹论尹焞之“守”与“半”,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被公认为最能严守师说的尹焞,何以居然就只能谨守“敬”这一半的师说,而无视程门另一半“格物”宗旨? 这究竟是尹焞之失,还是朱熹在新的理学架构下对于程颐思想和程门的误判?⑭

---

① 《二程集》,第 437 页。
②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七,第 848 页。
③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 2575—2576 页。
④ 申淑华:《〈四书章句集注〉引文考证》,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年版,第 4 页。
⑤ 《朱子语类》卷一九,第 442—443 页。
⑥ 《宋元学案》卷二七,《黄宗羲全集》第 4 册,第 270、265 页;《和靖尹先生文集》卷六,第 837 页。
⑦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 2575 页。
⑧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 2576 页。
⑨ 《宋元学案》卷二七,《黄宗羲全集》第 4 册,第 264 页。
⑩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 2575—2576 页。
⑪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 2577 页。
⑫ 《朱子语类》卷一八,第 416 页。
⑬ 《宋元学案》卷七,《黄宗羲全集》第 3 册,第 342 页。
⑭ 其实朱熹也曾承认: “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参见《朱子语类》卷一二,第 210 页。

五、朱熹的程门格物说建构

程门重敬,无须详述,如说“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内’”①;又如上节所言,尹焞初入程门,程颐便令看敬字,而自涪陵归后,程颐与尹焞几乎“日日相见”,程颐之教诲尹焞以为论“敬”之工夫外更无计较。②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程颐、程门是否如朱熹一般看待格物,以及格物与敬的关系。

朱熹对以程门格物说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格物论,有三段篇幅颇长的总评,即在《大学或问》前后相续的“程子格物十七条”“近世大儒格物致知说”和“程门后学格物穷理说”三条。③

所谓“程子格物十七条”,即朱熹从二程文献中精选了与格物相关的十七条材料,又细分为三部分,随后加以解释其用意。三部分分别为“(首)两条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当先而不可后之意”“(中)十条者,皆言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与其次第功程也”“(后)五条者,又言涵养本原之功,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作为朱熹基于自身学术立场再建构的文本,难免会有所争议,④与本文最相关的,是第三部分“涵养本原之功,所以为格物致知之本者”的“后五条”。

“后五条”实质是处理持敬、格物二者之关系。朱熹的案语,虽然也承认持敬为格物之本,也引用了一条“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但朱熹避开了程颐文献中如“程先生教人以敬为本”,“程先生所说,格物之要,在以诚敬为主”等更强烈的以敬为本、为主的文献,反而不断提升格物之重要性,以使得持敬和格物形成并重的工夫双翼。这五条中,最能支持朱熹持敬格物工夫双翼的一条,便是朱子学中极为知名、被后世反复发挥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然而,“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句,在二程文献中是出自刘元承所记伊川语录,全文仅此一句,并无上下文语境。⑤ 此语能否作为程颐在义理结构上有持敬、格物并重的工夫架构,值得商榷。即便如朱熹所言,尹焞并不重视格物工夫,但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亦援引尹焞如下文字:

> 尹氏曰:“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⑥
> 尹氏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⑦

尹焞有类似重格物之言论,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之发挥成朱子式的功夫双翼。尹焞此语,只是顺着《论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仁者不忧,知者不惑”而发。同理,程颐所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亦不可视为程颐功夫双翼之确证。儒家经典中本就有重学、论格物之语,儒家传统之重学,程门论格物,和朱熹在义理架构层面极重格物,不宜等同视之。

另可补充一佐证。“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最容易被视为持敬格物工夫当并重、不分先后,但若非论其先后,则朱子学者更易接受格物在先、而难以接受持敬在先。⑧ 朱熹在《或问》“程子格物十七条”的评述部分,特别指出程颐之言论和《易传》《中庸》《孟子》等经典,最终的指向是格物致知“在乎固守力行之先”。⑨ 但这恰与尹焞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尹焞晚年受命为宋高宗经筵讲读《论语》时,尹焞曾

---

① 《二程集》,第 152 页。
② 《二程集》,第 444 页。
③ 《四书或问》,《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6 册,第 524—532 页。
④ 如陈来以为第二部分朱熹所选的程颐文献中,有的主张格物需一件件格去以待积累贯通,有的则主张可以在一物上穷尽其理而后类推,两者自相矛盾,后者恐为门人误记。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4 页。
⑤ 《二程集》,第 188 页。刘元承所记语录,多留意格物之说,与其他门人稍有不同。
⑥ 《四书章句集注》,第 93 页。
⑦ 《四书章句集注》,第 156 页。
⑧ 吴震:《朱子思想再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年版,第 263—264 页。
⑨ 《四书或问》,《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6 册,第 526 页。

特别强调“学贵于力行,不贵空言”,此后尹焞门人王时敏亦记尹焞于门人回忆此次经筵讲义,尹焞以为当时所讲,唯此一句,是其本意。① 儒家固然可以知行并重,但以尹焞之立场,恐无法接受格物在力行之先的观点。

“近世大儒格物致知说”和“程门后学格物穷理说”,虽未明确点名,但“近世大儒格物致知说”中针对的是司马光和张载,“程门后学格物穷理说”针对的分别是吕大临、谢良佐、杨时、尹焞、胡安国和胡宏。此两段文字颇长,不过《朱子语类》中有一段简化的平行文本可观其梗概:

> 《或问》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说曰:“格,犹捍也,御也,能捍御外物,而后能知至道。”温公。“必穷物之理同出于一为格物。”吕与叔。“穷理只是寻个是处。”上蔡。“天下之物不可胜穷,然皆备于我而非从外得。”龟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程子之言。”和靖。“物物致察,宛转归已。”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厌不弃,而身亲格之。”五峰。②

简言之,朱熹对于北宋以来格物诸说,多有所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与程颐格物说内在的张力有关,主要涉及几个层面,道德知识的觉醒是否需要依赖客观知识,向外格物如何能发明内在本心,以及外物无穷如何格尽等问题。③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尹焞“‘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程子之言”给朱熹带来的挑战。语类中弟子曾专门问及此条,朱熹以为:“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为非伊川之言者,和靖也。和靖且是深信程子者。想是此等说话不曾闻得,或是其心不以为然,故于此说有所不领会耳。”④朱熹一方面认同尹焞是尊信程颐之门人,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尹焞否定这句话或有两种原因,即尹焞未曾听闻程颐有此说,又或者尹焞对此说不认可。在《或问》中,朱熹对这两点都作了回应,对于前一原因,朱熹以为类似逐日格物的表述,程门高弟不止一人提及,“安得遽以(尹焞)一人之所未闻,而尽废众人之所共闻者哉”;对于后一原因,朱熹以为尹焞可能是“习于持敬之约,而厌夫观理之烦”。⑤ 但朱熹的回应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尹焞作为程颐晚年最为亲近信赖的弟子,若他真的不曾听闻此句,那恐怕这就非程颐晚年反复强调的核心表述;作为公认的恪守师说之人,尹焞如此公开反对此在程门中流行的表述非程颐之语,他的态度究竟是个人重持敬而轻格物,还是代表着他所理解的程颐晚年定论?

简言之,如学者所熟知,朱熹在中和新说后,形成了格物、持敬并重的工夫论体系,但此前研究较少留意到,为了实现这一点,特别是较之北宋以来、尤其是程门内部普遍得到认同的持敬工夫,朱熹需要提升格物的重要性。朱熹的策略,一方面是如何利用程颐的文本建立与自身义理贴合的新诠释,另一方面则是对北宋以来、特别是程门内部的格物学进行整体批判,个别疑难之处甚至将之视为未得师说精髓而规避这些挑战。

二程研究,许多问题或因文献不足征而难有彻底坐实之证据。但另可补充相关辅助证据。其一,相较于程门弟子在《论语》《中庸》注解方面的热情,程门弟子对于《大学》则较为忽略,或许除了吕本中《大学解》,程门几乎不注《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明程门对于“格物”议题的重视程度稍有

---

①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四,第 808 页;《和靖尹先生文集》卷六,第 833 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八,第 416—417 页。

③ 南宋理学在《大学》语境中,多以致知与格物、持敬与格物、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关系加以讨论,但其实质是外向型格物说必然要解决的外物与本心之间的张力问题。蔡仁厚亦曾将程子格物论内在的相关问题归结为数项。参见蔡仁厚:《宋明理学·北宋篇》,台北:学生书局 1977 年版,第 438—439 页。对于朱熹对北宋以来格物说之基础与批判,本人另有专文研究,此不详述,本节仅论述与主题相关的部分要点。新近的研究,特别是朱熹如何研判程子格物十七条,可参吴震:《朱子思想再读》第五章“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子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④ 《朱子语类》卷一八,第 417 页。

⑤ 《四书或问》,《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6 册,第 531 页。

不足。而程门仅有的吕本中《大学解》,恰又是朱熹《杂学辨》中集中反驳的几家之一。其二,程颐晚年在《周易程氏传》各卦中,如大过、坎、暌、蹇、困等卦,又或者在解释经文中如舜、文王、箕子之处坎险艰困之境,格外注重敬的阐发。在程颐心目中,他之被贬谪于涪陵,与此前圣贤之处境,亦有相似之处,而程颐的应对,也不过以诚敬而守中道而已。程颐晚年论及敬之工夫,常有"深以为然""甚爱"之语,①但论及格物,则少有如此感情浓厚之词。当然,严格来说,《周易》经文本身并不适合发挥格物思想,引此并不能绝对证明程颐晚年不论格物,但程颐晚年重敬当无疑义。

六、程颐晚年定论说的补充证据与意义

本文所论程颐晚年定论说,在研究中固然存在文献不足征之困难,但此说亦非孤证。尹焞之外,宋人尚有郭忠孝传程门晚年中庸学的说法。南宋黎立武在《中庸指归》中便明确说:

> 兼山(郭忠孝)继登程门,终始中庸之道,体用之说,实得于心传面命者也。程子尝为《中庸》作注,至是焚稿,而属兼山以书传之。乃知游氏、杨氏所得于师者,初年之论也。吕氏以深潜缜密称,实颇融贯,而其师始未然之者,未定之论也。盖至兼山,则师弟子之讲贯熟、决择审矣。然则求中庸之道于伊洛,微兼山氏,吾谁与归?②

在黎立武看来,程颐是有一明确的中庸学,而游酢、杨时之中庸学,仅是程颐初年未定之论。黎立武甚至暗讽通过批评游酢、杨时、吕大临而建立新的中庸学的朱熹,恐怕也不符合程颐之说。如黎立武批评解"中"之说,"今而曰篇名一义,经文又一义,中庸一中,中和又一中",所针对的,恐怕就是朱熹论"中"最为典范的"中有二义"。③

有意思的是,郭忠孝之子郭雍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也曾论述宋代理学道统:

> 宋兴百有余载,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横渠张先生出焉……先人受业伊川先生二十余年,雍始生之时,横渠、明道久已谢世,甫四岁而伊川殁,独闻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学所行,所以教授,多见于《易》与《春秋》《中庸》《论语》、孟氏之书,是以门人率于此尽心焉……重念先人之学殆将泯绝,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惧无以遗子孙,于是潜稽易象,以述旧闻,用传于家,使毋忘先生之业,道虽不足,志则有余矣。④

此序之中,郭雍无疑认为其父子二人,是能传二程之正脉。此序作时,朱熹年仅二十余岁,但至淳熙年间,郭雍依旧健在,此时朱熹早已名动天下,郭雍之论朱熹尚未可知,但朱熹对于郭氏父子即所谓兼山学派,则是多有批评。如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年致门人信中就告诫道:"郭子和(即郭雍)《中庸》,顷曾见之,切不可看,看着转迷闷也。"⑤在《朱子语类》中,朱熹也批评"郭以兼山学自名,是其学只一艮卦"。⑥ 但朱熹也深知,郭忠孝是程颐晚年亲传弟子,他也曾和学生感慨:"如兼山《易》《中庸》义多不可晓,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⑦朱熹固然可以批评郭氏父子学杂难以得程颐思想精要,但从逻辑上,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朱熹自身的思想,与程颐晚年思想本就存在不契之处。

---

① 《二程集》,第 444—445 页。"甚爱"一处,难以系年,但"深以为然"一条无疑是晚年之心境。

② 黎立武:《中庸指归》,《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00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719—720 页。关于黎立武的相关研究,可参许家星:《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论黎立武的〈中庸分章〉研究及其思想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第 31—39 页;许家星:《〈易〉与〈中庸〉相为经纬——论黎立武以〈易〉解〈中庸〉的思想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第 37—45 页。

③ 黎立武:《中庸指归》,第 720—721 页。

④ 郭雍:《郭氏传家易说·自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 册,第 3 页。

⑤ 《朱文公文集》卷四五,《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22 册,第 2070 页。

⑥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 2579 页。

⑦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第 2560 页。

除了尹焞、郭忠孝,朱熹对程颐晚年弟子如张绎,也有一些保留意见,如在答陆门弟子信中,朱熹便反对程颐语录中"心生道"一语,以为"此段是张思叔所记,多以己意文先生之辞,恐不能无少失真也"。① 对于"心生道"这样敏感的理学表述,究竟是程颐晚年最具天赋的弟子张绎误记师说; 还是朱熹思想未能契合程颐晚年此说,且又警惕此说容易为陆学张目,进而否认张绎所记的真实性。

诚如前文所言,所谓程颐晚年定论说,难免存在文献不足征的研究困难。但通过尹焞等程颐晚年弟子与程门早年弟子、朱熹之间显著张力的呈现,将有助于学界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的可能性。上文曾论及程朱格物说之异同,此前学者多能留意到朱熹论格物,"其纲领实本于伊川",有所发明之处,亦"决不悖于伊川"。② 但若考虑到程颐晚年思想的可能性,以及尹焞等人作为程颐晚年之学继承者的可能性,或许传统的程朱理学叙事,有进一步检视的必要。

朱熹倾其一生,对北宋理学进行了极好的继承与发扬,朱子学是如此的具有解释力,以至于站在朱熹的视角看北宋,几乎成了前朱熹时代理学史研究中最坚固的研究范式。但朱熹站在其学术立场上,也对北宋理学史以及广义的北宋思想史进行了重构,这种重构的过程中也遮蔽了许多思想演变与发展的真相。尹焞和程颐晚年定论说的研究,或将有助于学界重新思考"程朱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Faithful to the Half: the Intellectual Transmission from Cheng Yi to Yin Tun, and Cheng Yi's Final Established Doctrine

Tang Yuanso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disciples of the Cheng's brothers, Cheng Hao (程颢) and Cheng Yi (程颐), could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early and late generations. Among the latter, Yin Tun (尹焞) was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student during Cheng Yi's final years. Zhu Xi (朱熹), in constructing his vis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offered systematic criticisms of the Cheng's school (程门), often portraying its disciples in a negative light. Yet even before Zhu, Yin Tun had already voiced similar critiques. Under Zhu Xi's influence, Neo-Confucian historiographers usually characterized Yin Tun as a conservative thinker who merely preserved Cheng Yi's doctrine on "self-restraint reverence" (主敬). However, from Yin Tun's own standpoint, such conservatism signified a faithful adherence to his teacher's doctrine. As a disciple highly affirmed by Cheng Yi in his late years, Yin Tun's critique of his peers and steadfast defense of his master's teaching may reflect an alternative version of Cheng Yi's final established doctrine — one centered solely on "self-restraint reverence" (主敬), rather than the dual framework of "self-restraint reverence"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格物), which was later emphasized by Zhu Xi. Zhu's ambivalent view of Yin Tun, while praising him as one who "deeply believed in Master Cheng", yet faulting him for excess in self-restraint with reverence and deficiency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reveals the image of a disciple who partially adhered to his master's teaching. This portrayal of Yin Tun also embodied a deeper tension between Cheng Yi's thought and its reinterpretation in the Cheng - Zhu tradition.

Key words: Yin Tun; the Cheng's School; Cheng Yi; self-restraint with reverence; Confucian orthodoxy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朱文公文集》卷五一,《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22 册,第 2386 页。后朱熹更以为此"必是当时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朱子语类》卷九五,第 2439 页)。

② 蔡仁厚:《宋明理学·北宋篇》,第 436、440 页。